

明长城资源的多学科整合与长城学的构建

田澍, 马维仁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 学界对明代长城资源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内容主要集中于对明长城的界定和明长城资源内涵的探讨, 并对明长城建筑资源、明长城传统文献资源、明长城碑铭和舆图资源、明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整理。从现有成果来看, 对明长城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成绩显著, 但中国学术界在长城理论创新方面不足。而要发出中国学者在长城研究方面的独特声音, 就必须走多学科交融发展之路。

[关键词] 明长城; 边墙; 九边; 防御体系; 长城学

[中图分类号] K87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9)06-0078-09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9.06.010

长城在不同时期称呼不一, 有“方城”“列城”“长堑”“墙堑”“长垣”“紫塞”“寨垣”“边垣”“寨围”“壕堑”“界壕”“边墙”等等, 后逐渐统称“长城”, 她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 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一种鲜明的文化符号, 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坚强不屈的品格。长城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是人类文化的瑰宝。除秦、汉、隋、明诸朝外, 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等皆修过长城。为了防御蒙古贵族的侵扰, 明朝先后设置九大边镇, 并逐渐修筑“边墙”“城堡”等防御工事来确保国防安全。今天人们所说的长城, 主要是指明长城。梳理学界有关明长城内涵的认识和明长城资源的调查与文献整理的成果, 对进一步深化多学科交融研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长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一、明长城的内涵

明代九边体制“从永乐时期开始逐步构建, 弘治至正德年间全面形成”^①, 与明朝迁都北京以示“天子戍边”而构建“大一统”的国策相一致。在九边的防御体系中, “京师, 犹人之腹心也; 宣、大, 项背也; 晋、蓟、东辽, 肘腋也; 延、宁, 肢

体也; 甘肃, 踵足也。”^②可以说, 明长城是“九边”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特殊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明长城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吴晗在分析长城利弊后指出: 虽然长城“不能完全堵住北方各民族向南发动战争, 但是, 无论如何, 它起了一部分作用, 至少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防御工事, 使得长城以南众多的人口可以从事和平的生产。把长城的作用估计过高, 认为有了这一条防线, 北方的少数民族就进不来了, 这是错误的。他们还是进来了, 而且进来不止一次。但是, 由于有了这个防御工事, 使得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军事进攻受到阻碍, 这种作用, 直到明朝还是存在的。只有到了清朝, 这样的作用才不存在了。”^③由于明代立国久远, 不断完善和修葺的长城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以前诸朝。明朝依靠长城成功地遏制了元朝残余的南下, 持续巩固了北京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客观上为清朝进一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故不能简单地将明长城与其他诸朝长城相提并论。只有把明长城放在中华民族交融和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大背景下, 才能理性地认识其在民族交融中所拥有的特殊意义和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元明两朝更替的大背景下, 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 面对元朝残余势力的依然强

[收稿日期] 2019-0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边疆治理视野下的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研究”(18AZS0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安全视野下的明代西北军事防区调整与演变研究”(16XZS015)

[第一作者简介] 田澍(1964—), 男, 甘肃通渭人, 历史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明清史研究

大和他们的不甘失败，明朝面临着空前的军事压力，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在财力和民力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超越前代而大规模和持续地修筑长城，便成为有明一代时刻面临的核心问题和不二选择。正如阿瑟·沃尔德隆所言：“明朝的城墙建筑并非任何人的首选，它只是在其他提议被否决后才被采用的。”^④

明代的“边墙”与“长城”并非同义。在明朝的官方用语中，“边墙”只是北部防御工事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巡抚宁夏右金都御史崔让等奏请：“于平虏城枣儿沟增筑边墙一道，塞堡一座，墩台三座。”^⑤《明史·戚继光传》亦曾言：“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⑥明朝的北部防御体系包括边墙、城堡、墩台、壕堑等，故宣德四年（1429）朝臣言：“雨潦颓坏长城墩隘，请益兵修筑，濬其壕堑。”^⑦所以说，“边墙”与“城堡”“墩台”“壕堑”等共同构成了明代的“长城”。正由于此，明臣常将“边墙墩堡”“边墙营堡”“壕堑边墙”“边墙墩台”并用。可见，明长城是由绵延的边墙或壕堑与众多的城堡等工事构成的综合防御体系，具有“围墙”的性质，是明朝边防的警戒线，是明朝进攻的依托和防御的底线，但绝不是划分“边界”的标志。葛剑雄为此说道：明长城也不一定“完全按照当时的疆域范围建筑”，“由于鞑靼、瓦剌以游牧为主，实力也有盛有衰，有时逼近长城，有时又退得很远。明朝的实际控制区也常常越出长城，在长城以北还存在一些双方势力交错或者都不加控制的地区。”^⑧

在具体的解读中，学界对明长城的认识分歧较大。如《长城百科全书》认为长城是由“绵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关堡，以及各种战斗设施、生活设施、报警烽堠、道路网络等组成。是一条以城墙为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纵深梯次相贯，点线结合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⑨侯仁之的认识与此大致相同，认为长城是“针对相对固定的作战对象，按照统一的战略，以人工筑城方式加强与改造既定战场，而形成的一种绵亘万里，点阵结合，纵深梯次的巨型坚固设防体系。”^⑩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的《明长城》继承了此类观点，认为：“长城由墙体、敌台、马面、烽火台、关、堡等多种防御工事组成，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⑪《中国长城志》亦言：“长城是中国古代由连续性墙体及配套的关隘、城堡、烽燧等构成体系的巨型军事防御工程。”^⑫赖建诚对修筑城墙的材

料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大致可分为：“砖墙（内含夯土或三合土）、条石墙、块石墙、夯土墙、沙砾石、红柳或芦苇混合夯筑。从现代的遗迹来看，以夯土墙和砖石墙的数量最多。若以地区来分，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地区的边墙以砖石墙为主；夯土墙多分布在宁夏、甘肃沙漠边缘；较精华的地区，如北京八达岭、密云与滦平的金山岭，都是以夯土、三合土、碎石为内，外面包砖。”而长城的“堡城”别称“障城”，是“防线上驻军和囤积粮草、武器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军营，是驻扎军队、调防、应急、饲养军马和骆驼的地方。”^⑬事实上，明长城还应该包括壕堑、烽火台和边墙以外的其他防御设施等，而且也不能用连续的“一条”来表述其状态，必须注意不同时期的“大边”与“小边”、“外边”与“内边”、“旧边”与“新边”等情形。

与以上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有些学者将长城仅仅看成是“城墙”。如《汉语大辞典》认为长城是“供防御用的绵亘不绝的城墙。”^⑭景爱亦言：“长城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系古代边境御敌的军事工程。”同时，他进一步指出长城应包括五种内容或层次，即：长城是连续性高城墙；长城以土、石、砖垒筑；长城属于御敌的军事工程；长城修筑在边境地区；长城是古代建筑物。^⑮曹永年也认为：“长城本身只是附设墩台、敌楼、堡寨等建筑体系的一堵墙，是军事防御的一种有力的手段。”^⑯突出明长城“墙”的特性有一定的道理，但把明代“长城”简单地看成“城墙”或“墙”，则是不可取的。

如何确定明长城的具体点段，学界的看法也不一致，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辽东边墙是否为明长城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辽东边墙不是明长城，故不能将其纳入明长城体系进行讨论。如《辞海》的修撰者认为：“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时，前后修筑长城达十八次，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称为‘边墙’。宣化大同二镇之南，直隶山西界上，并筑有内长城，称为‘次边’。总长约6700公里。”^⑰《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在解释“山海关”时说：该关“历来被视为万里长城之东部起点”^⑱。卢耀光指出：“我们见到的长城多为明代所建，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穿越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等7个省、市、自治区，全长达6300余公里。”^⑲李汉才也认为：“今日我们所见的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

这条长城，则是明代最终定型的长城。”^②这些界定，无疑是将辽东边墙划在明长城范围之外。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辽东长城应该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史念海就认为：“边墙之修筑，非至山海关即止也，今辽宁省中尚有若干段，依稀可见，亦明人之遗迹。明代辽东边外，西有兀良哈，东有建州之女真，皆常为边患，明廷即于其地分建边墙，以防御之。”^③王国良的《中国长城沿革考》^④也肯定了辽东长城的存在。随着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长城保护意识的增强，对辽东长城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华夏子在实地踏查明长城后确定了辽东长城的具体位置和走向，“由山海关老龙头，沿峰峦连绵的山脉，向北蜿蜒，约一百二十华里，至海拔五百二十五米锥子山燕窝砬子处。由此长城分为东、西两个方向：向西而去的是蓟镇主体城墙，向东而筑的便是辽东镇长城。”具体分为三个部分，即辽河西长城，辽河套长城，辽河东长城。^⑤刘谦通过实地考察，认为“鸭绿江是中国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⑥。《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在“长城”一词中指出：“明代为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前后经历二百多年，基本完成长城修筑工程，东起鸭绿江边虎山南麓，西抵嘉峪关，全长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称为‘边墙’。”^⑦郑毅亦明确指出：“中国古代长城的最东段并不是山海关，而是直抵鸭绿江边，基本囊括了辽宁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辽宁其实也是关内省份，辽宁人其实也是关内人。”^⑧可以说，将辽东长城纳入明代长城之中，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是关于青海边墙是否为明长城的问题。西宁卫是明代“河西十五卫所”之一，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战略地位，明朝在修筑西宁卫城的同时，在其周围“列置堡寨、烽墩”，“又于西川、南川及北川等处构筑边墙、边榨，形成了一个以卫城为中心的较为完固的防御体系。”^⑨《长城百科全书》在解释“明长城”时指出：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9省、市、自治区，全长6300多公里，俗称‘万里长城’。”^⑩这一界定将青海边墙排除在外。卢耀光认为青海边墙从其建筑形式、内涵和规模来看，均不应称其为长城，而应称为“塞垣”。其理由是青海边墙基本上是青海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一条分界线；西宁卫边墙形制独特，构成复杂；西宁边墙的规模较小。^⑪但李汉

才认为西宁边墙是长城的延长和补充，是我国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⑫蒲天彪也认为青海省境内的明长城是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⑬陈军、金舒平、廖安平等在《明长城资源调查与测量综述》一文中，公布了明长城长度测量结果，指出明长城东起辽宁丹东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穿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10个省、市、自治区，总坡面长度为8851.8km，包括人工墙体为6259.6km，天然段2232.5km，壕堑359.7km。并指出明长城分布地域广（10省市自治区）、时间跨度长（800多年）、格局较为复杂（含内边、外边、支线）。^⑭2012年，《青海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⑮正式出版，标志着关于青海省长城作为明长城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得以确立。

二、明长城的建筑遗存

在第三次全国明长城资源调查中，所设定的明长城资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墙体；敌台、马面、关、堡、烽燧等长城附属设施；采石场、碑刻、驿站等相关遗存。为此需要在沿长城两侧各1公里范围内开展田野调查和专业考证，采集相应文物标本，进行专业著录、拍照、录像、量测、绘图等。”^⑯由此可知，在此次明长城资源调查中，明长城资源的内涵主要包括明长城墙体、明长城附属设施和明长城相关遗存等。2016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国长城保护报告》，指出：“将春秋战国至明等各时代修筑的长城墙体、敌楼、壕堑、关隘、城堡以及烽火台等相关历史遗存认定为长城资源，将其他具备长城特征的文化遗产纳入《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范畴。”^⑰近代以来，由于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考古调查的影响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需要，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和组织北方长城资源的调查和研究。1927年至1933年，中国和瑞典学者共同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旭生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瑞双方的团长，从北京出发，经包头、百灵庙，最后到达我国新疆地区进行调查。1942年至1943年，由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向达、石璋如等人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赴河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考察了该地区的汉长城和明长城。1943年，中央博物院研究员李文信对内蒙古敖汉旗至辽宁建平县境内的长城进行了调查。1944—1945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

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再次前往河西地区进行考察。虽然以上这些考察并非完全针对明长城资源的专题考察，但明长城资源是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对明长城在内的中国历代长城资源的保护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成立了各级文物保护和管理机构，对长城遗址、遗存的调查工作也逐步展开。从1952年起，对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等长城重点段陆续开展了调查和保护工作。1956年实施的首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北京、河北、甘肃、宁夏等地将明长城作为调查重点。1979—1984年，结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各地对重要区域的春秋战国长城、秦汉长城、明长城和金界壕等遗址进行调查，出版了《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⑤对我国长城资源有了进一步认识。2006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文物局组织长城沿线各地开展了建国以来最为全面、系统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⑥在历次长城资源调查中，明长城均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通过明长城资源的调查，学术界进一步掌握了明长城资源的分布、走向、构成、保存现状等基本状况，并于2010年开始陆续出版明长城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⑦在实地考察和测量基础上出版的这些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是开展明长城资源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明长城资源保护的重要依据。

除了全国性的明长城资源调查外，多年来，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个人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长城资源调查、勘测和研究工作。

1979年，刘谦从山海关出发，一路向东，直到鸭绿江边，历时56天，对辽东段明长城进行了实地考察，最后整理出版了《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⑧。1984—1985年，化名“华夏子”的董耀会、吴德玉、张元华三人从山海关出发，历时五百多天，徒步考察了明长城，并写成了《明长城考实》^⑨。20世纪80年代，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长城爱好者高旺对清水河县境内的明长城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内蒙古长城史话》^⑩。这些区域性的调查成果也为学界进一步了解明长城资源作出了积极贡献。

西方学者和长城爱好者也致力于对明长城的考察。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生前曾多次前来中国考察，1909年出版了The Great Wall of China^⑪一书。该书对长城的起源、修筑、目的、功能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美国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沿着长城考察中国的边疆和商路，其代表作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文版名《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影响最大。他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综合利用社会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等方法，将中国北部边疆划分为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四个各具独立特征的部分，提出了长城“边缘地带”的概念，认为长城“有许多不同的、交替变化的、附加的线路，这些变化可作为各个历史时期进退的标志来研究。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绝对的地理事实。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⑫英国人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是20世纪后期研究中国长城较有影响的西方学者。1987年，林赛来到中国，并徒步考察了明长城。他先后出版了多部专著，向西方全面介绍了中国长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六合建筑工作室在学术界已有的长城本体调查和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基础上，以“长城军事聚落”为主攻方向，将长城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作为一个巨大时空跨度的统一整体来考察。他们利用自主研发的“无人机空一地协同”信息技术平台，引进了“历史空间信息分析技术”，并运用虚拟现实、地理定位系统等技术手段，对长城军事聚落整体时空布局和层次体系进行了全新的研究和呈现，空前地深化了对明长城的整体性、层次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该研究团队已取得了较为丰富和系统的研究成果^⑬，代表着明长城资源调查和研究的新方向。

三、明长城文化资源的内涵与整理

学界对明长城文化资源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传统文献资源、碑刻与舆图资源、诗词与故事传说等方面。

明长城传统文献资源是指官方档案、正史、文集、方志、碑刻、舆图、调查报告等，内容涉及与明长城有关的边镇、堡垒、关隘、军事、民族、经济、对外交往、风俗、人物、建筑等。这类资料量大面广，是明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庸在《中国地理图籍丛考》^⑭甲编之《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中统计了此类文献的数量，其中“九边总图说”30种，“边镇合志”30种，“各边镇别志”64种，“各路关卫区分记”91种，共计215种。但此书在收录时筛选过于严格，因此，仍有大量相关文

献未被纳入。《中国长城志》^⑥的《文献》卷对明长城传统文献资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收录了官修史书、边塞志书、兵书、铭文碑碣中有关明长城的内容,是目前较为全面的明长城文献汇编。此外,张志军《明实录长城资料辑录》^⑦和何宝善《明实录长城史料》^⑧均集中从《明实录》中辑录关于长城的文献资料,便于研究者检索和查阅史料。苗润莲、冯广平《北京地区长城研究文献名录》^⑨、尚珩《山西明长城文献综述》^⑩,分别对北京和山西地区有关明长城文献进行了整理。彭勇、崔继来对明人刘效祖针对蓟州镇、昌平镇、真保镇、辽东镇和居庸关、紫荆关、山海关而编撰的《四镇三关志》进行了校注。^⑪

在明长城碑铭调查与整理方面,河北省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队编辑的《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⑫是历年河北省明代长城资源调查中获得碑刻及其他金石文献资料的汇编,内容包括城工碑,阅视、鼎建碑,纪年记事刻石,门额、台铭刻石,边塞摩崖石刻,相关碑刻,墓碑、墓志铭,佚碑录文,文字砖,炮铳铭文 10 个类别,详细记录了碑铭刻石的收藏、采集地点、材质规格、形制纹饰等基本信息,并配以大量拓片照片,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此外,薛仰敬主编的《兰州古今碑刻》^⑬,王毅主编的《武清碑刻集》^⑭,王书珍主编的《迁西石刻》^⑮,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怀柔碑刻选》^⑯,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编辑的《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⑰,内蒙古高校人文社科中国北疆史重点研究基地、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主编的《内蒙古清水河县碑刻辑录》^⑱,郑亚军、吴景山编校的《嘉峪关金石校释》^⑲等也收录了许多明长城碑铭,可以弥补传统文献之不足,具有特殊的价值。

舆图资源是明长城的重要资源之一,主要包括明人编纂的关于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边防图集和清代以来绘制编纂而成的舆图集。杨守敬和饶敦秩绘制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⑳是现存较早且较为完整的地图集,该书较为详细地标注了明长城的走向和位置。王庸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㉑对中国古代地图进行了考证,其中涉及许多与明长城有关的舆地图。李孝聪的《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㉒对欧洲各国收藏的部分中文古地图进行了考证和介绍,其中包括了许多与明长城有关的地图,十分珍贵。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㉓对明长城作了详细标注,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明长城地图集。《中国长城志》卷 1《图志》^㉔是目前最新、影响最大的明长城舆图整理研究成果,该书对明长城舆图资源进行了搜集和整理。此书收录的明长城舆图主要包括明长城的历史地图和现代地图。其中现代地图主要包含航拍照片、卫星遥感监视画面、细部摄影等内容,以展示明长城当前的保存状况,这些地图、照片与明长城历史地图相互印证,使读者对明长城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在各省已经出版的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中,均附有明长城地图,这些地图非常直观地展现了该地区明长城的分布状况及其保存现状。

另外,在一些有关明长城的研究专著中,也附有一些明长城舆图。如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㉕共收录历代长城舆图 35 幅;寿鹏飞《历代长城考》^㉖书末收录历代长城舆图 1 幅;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㉗一书中有插图 118 幅,书末附图版 62 张;高凤山、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㉘书末附图版 24 张等。

明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我国各族人民在明长城周边生产生活所产生的非物质形态的、有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文化资源,是人们在以明长城为场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伴随明长城的修建,修城者、守城者及其后代以及生活在长城沿线的民众繁衍生息,保存了诸多与明长城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整理这些资源对研究历史、保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均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对明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明长城故事传说、诗歌、散文等文学资源方面,而对于明长城艺术资源、民俗资源等调查研究相对较少。在明长城诗词整理方面,李奋起的《长城名咏集》^㉙,梁志林、韩盼山的《万里长城诗选》^㉚,徐红年的《八达岭长城古诗咏》^㉛,孙志升的《长城古诗二百首》^㉜,等等,专题性强,主题突出。

在明长城故事传说搜集整理方面,也有一些重要成果,如华山文艺出版社编的《长城传说故事》^㉝,李克主编的《中国长城故事集》^㉞,孟广臣的《长城脚下的传说》^㉟,严农的《长城的故事》^㊱,宋梦寅、董侃的《万里长城传说》^㊲,白庚胜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㊳,谷丽霞的《万里长城的故事》^㊴,张鹤珊的《长城民间传说》^㊵等。如果说明长城诗词反映的主要是官僚士大夫的长城观的话,那么明长城传说故事则更多地反映基层民众的长城

观,因此,对明长城诗词、故事传说的整理和研究,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基层社会中一般民众对明长城的看法。此外,亦有学者对明长城楹联进行了调查和整理,如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编辑部、中国楹联学会楹联丛书编辑部编辑的《长城楹联荟萃》^⑧,樊明芳、熊松华、唐少豪等选编的《名胜古迹楹联选》^⑨,白雉山选编的《古今楹联选编》^⑩等均涉及明长城的有关楹联内容。

四、多学科整合是构建长城学的客观要求

2001年,罗哲文在肯定半个多世纪以来长城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绩的同时,也理性地指出:“长城的内容非常丰富,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在理论上将长城作为一门学科的‘长城学’正在兴起。在实践上对长城的实地考察测绘尚未完成,需要研究的课题尚多,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⑪此言甚是。尽管近年来包括明长城在内的长城研究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但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长城学”还处在起步阶段,任重道远。

从文物角度来界定长城资源内涵对进一步调查、研究以及保护明长城资源具有具体和现实的指导意义,但由于范围过于狭窄,在客观上对明长城资源的发掘和保护又会产生不利的影 响。保存较为完好的明长城不应仅指墙体,敌台、马面、关、堡、烽燧等设施,以及采石场、碑刻、驿站等相关遗存,与明长城有关的传统文献,图像、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皆应视为其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历次明长城建筑资源调查中,调查的对象主要包括明长城本体、附属设施和相关遗存等。从已出版的各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来看,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这些资源的时代、行政区划、地理坐标、建筑形式、结构、走向、长度、保存状况等。但是,将明长城资源的调查范围限定在沿线两侧1公里以内的简单规定明显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尽管《中国长城志》因新出而内容相对丰富,但其对未公布各省区的明长城资源有时依据过时的记载做了概略性介绍,故必须正视其编纂体例的不统一、资料的不全面和表述的不准确等问题。就明长城碑铭资源调查整理而言,目前只有河北省、辽宁省以及极少数地区对辖境内明长城碑铭资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其他绝大多数明长城沿线省市县对所辖境内明长城碑铭资源未做详细的调查与整理。舆图资源的调查整理大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对明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整理,尽管做了一些有价值的

工作,但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还有大量散存和流传于民间的艺术资源、民俗资源,如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社火、饮食、节日、礼俗等,仍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明长城的修筑与其他时期特别是秦汉两朝长城的关系,以及有关海外明长城资源调查、搜集与整理,学界所作的工作还远远不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随着研究的深入,必须突破以简单的军事防御视角来认识明长城的狭隘学风,应从多角度来理解明长城的作用与意义。如汪荣祖在肯定明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的同时,明确指出:“长城南北并不仅仅是对峙,双方也多有来往与交流,实际上仍然在延续秦汉以来夷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汉蒙两族在对边各有几十万的居民,汉人移往蒙古务农从商者尤多。”^⑫赵现海通过文献研读与实地调查,提出了“长城区域史”研究范式的概念,对单纯将长城视为军事设施的狭隘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应从两方面修订对长城内涵的认识:一方面,作为立体纵深的防御体系,“许多城堡、军寨、墩台,脱离边墙主体区域之外,距离甚至十分遥远,由于该界定较为简单而笼统,不便于准确认定这些军事设施是否是保护的 对象。如果不将之也划入长城范畴之内,无疑会产生一定甚至重大的遗漏”;另一方面,对于非军事设施部分的严重忽视,不仅使“长城保护内容少了一半”,而且对长城历史遗产的理解产生了偏差。为此他提出将长城周边的“民间聚落、信仰场所、方志、民间文献、族谱、碑刻、戏曲、传说等”遗产应纳入长城内涵之中,并加以切实的保护,并在此基础上考察长城与地理环境、军事能力、国家政治、经济财政、周边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活动关系。^⑬这一认识是很有见地的,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明长城丰富的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多学科交融发展的客观要求,应从广义和总体两方面来认识明长城的内涵、意义与影响,尽快形成中国自成体系而又有独特话语体系的“长城学”。只有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地理学、建筑学、民族学、美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生态学、管理学、文献学、信息学、文化遗产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来研究、开发和展示明长城,才能较好地认知其意蕴。也只有深化明长城的理论研究,提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概念和术语,提炼明长城的精神价值,解读长城在中

国“大一统”形成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才能真正发出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赵现海在肯定国内学者在长城及其资源调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目前中国长城研究只是在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严谨的学术研究凤毛麟角，单就研究方法而言，受到学术断层与学术整体水平之影响，中国学者的长城研究缺乏传统之积淀与不同学科方法之借鉴，虽然部分长城理论概

念开始提出，但基本皆关注于扩展长城研究内容，而不及研究方法之层面，尚处于不同学科各自为战之状况，跨学科之综合研究至今未能实现。”^⑩这种研究现状与长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极不匹配。学界应该认真反思，有所作为，切实注重多学科的交融与互动，引领长城学研究的走向，发出新时代中国学者的强音。

[注 释]

- ① 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页。
- ② [明]赵锦：《行都司题名记》，[清]钟赓起：《甘州府志校注》卷13《艺文志》，张志纯、郭兴圣、何成才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
- ③ 吴晗：《明朝简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1—72页。
- ④ [美]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金鑫荣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 ⑤ 《明宪宗实录》卷266，成化二十一年五月丙子，第4511页。
- ⑥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14页。
- ⑦ 《明宣宗实录》卷60，宣德四年十二月乙未，第1438页。
- ⑧ 葛剑雄：《历史上的中国》，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 ⑨ 中国长城学会：《长城百科全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 ⑩ 侯仁之：《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
- ⑪ 国家文物局：《明长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页。
- ⑫ 陈海燕、董耀会：《中国长城志·总述·大事记》，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9页。
- ⑬ 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7—238页。
- ⑭ 《汉语大辞典》（第11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第592页。
- ⑮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 ⑯ 曹永年：《明代蒙古史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
- ⑰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 ⑱ 《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 ⑲ 卢耀光：《青海的边墙》，《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 ⑳ 李汉才：《青海长城考略》，《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
- ㉑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270页。
- ㉒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 ㉓ 华夏子：《明长城考实》，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87页。
- ㉔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 ㉕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 ㉖ 郑毅：《“关内”还是“关外”——辽长城文化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8日第7版。
- ㉗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
- ㉘ 中国长城学会：《长城百科全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 ㉙ 卢耀光：《青海的边墙》，《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 ㉚ 李汉才：《青海长城考略》，《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
- ㉛ 蒲天彪：《青海省境内明长城保存现状分析与保护对策》，《文物》2011年第9期。
- ㉜ 陈军、金舒平、廖安平：《明长城资源调查与测量综述》，《地理信息世界》2011年第3期。
- ㉝ 青海省文物管理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 ㉞ 陈军、金舒平、廖安平：《明长城资源调查与测量综述》，《地理信息世界》2011年第3期。
- ㉟ 国家文物局：《中国长城保护报告》，2016 [2016—11—30]. http://www.sach.gov.cn/art/2016/11/30/art_1946_135711.html.

- ⑳ 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 ㉑ 国家文物局：《中国长城保护报告》，2016 [2016—11—30]。http://www.sach.gov.cn/art/2016/11/30/art_1946_135711.html。
- ㉒ 这些调查报告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有：《河北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2010年）、《辽宁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2011年）、《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2012年）、《青海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明长城卷》（201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2014年）、《陕西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2015年）、《山西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2019年）等。
- ㉓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 ㉔ 华夏子：《明长城考实》，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
- ㉕ 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 ㉖ William Edgar Geil,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New York: Sturgis & Walton Company, 1909.
- ㉗ [美]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 ㉘ 该团队已形成十余篇与明长城资源有关的博士论文，如李严：《明长城“九边”重镇军事防御性聚落研究》（天津大学，2007年）、谭立峰：《河北传统堡寨聚落演进机制研究》（天津大学，2007年）、刘珊珊：《明长城居庸关防区军事聚落防御性研究》（天津大学，2011年）、王琳峰：《明长城蓟镇军事防御性聚落研究》（天津大学，2012年）、刘建军：《明长城甘肃镇防御体系及其空间分析研究》（天津大学，2013年）、杨申茂：《明长城宣府镇军事聚落体系研究》（天津大学，2013年）、范熙晖：《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研究》（天津大学，2015年）、曹迎春：《明长城宣大山西三镇军事防御聚落体系宏观系统关系研究》（天津大学，2015年）、常玮：《明长城西北四镇军事聚落研究》（天津大学，2016年）、魏琰琰：《分统举要，纲维秩序——明辽东镇军事聚落分布及防御变迁研究》（天津大学，2016年）。2018年已由中国建筑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成果有李严、张玉坤、解丹：《明长城九边重镇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王琳峰、张玉坤、魏琰琰：《明长城蓟镇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魏琰琰、张玉坤、王琳峰：《明长城辽东镇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杨申茂、张玉坤、张萍：《明长城宣府镇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刘建军、张玉坤、谭立峰：《明长城甘肃镇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
- ㉙ 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 ㉚ 陈海燕、董耀会：《中国长城志》，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
- ㉛ 张志军：《明实录长城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
- ㉜ 何宝善：《明实录长城史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
- ㉝ 苗润莲、冯广平：《北京地区长城研究文献名录》，北京：知识出版社，2009年。
- ㉞ 尚珩：《山西明长城文献综述》，《沧桑》2009年第6期。
- ㉟ （明）刘效祖撰，彭勇、崔继来校注：《四镇三关志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
- ㊱ 河北省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队：《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 ㊲ 薛仰敬：《兰州古今碑刻》，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 ㊳ 王毅：《武清碑刻集》，天津市武清区文物管理保护委员会，2004年。
- ㊴ 王书珍：《迁西石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
- ㊵ 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怀柔碑刻选》，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年。
- ㊶ 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
- ㊷ 内蒙古高校人文社科中国北疆史重点研究基地、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内蒙古清水河县碑刻辑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5年。
- ㊸ 吴景山：《嘉峪关金石校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 ㊹ （清）杨守敬、饶敦秩：《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光绪二十四年江南王氏重绘石印线装本。
- ㊺ 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 ㊻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 ㊼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 ㊽ 陈海燕、董耀会：《中国长城志》，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
- ㊾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 ㊿ 寿鹏飞：《历代长城考》，民国三十年线装铅印本。
- ㊰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 ㊱ 高凤山、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 ㊲ 李奋起：《长城名咏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⑦① 梁志林、韩盼山：《万里长城诗选》，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
- ⑦② 徐红年：《八达岭长城古诗咏》，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
- ⑦③ 孙志升：《长城古诗二百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 ⑦④ 华山文艺出版社：《长城传说故事》，石家庄：华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
- ⑦⑤ 李克主编：《中国长城故事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
- ⑦⑥ 孟广臣：《长城脚下的传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
- ⑦⑦ 严农：《长城的故事》，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
- ⑦⑧ 宋梦寅、董侃：《万里长城传说》，台北：林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
- ⑦⑨ 白庚胜：《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
- ⑦⑩ 谷丽霞：《万里长城的故事》，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
- ⑧① 张鹤珊：《长城民间传说》，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年。
- ⑧② 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编辑部、中国楹联学会楹联丛书编辑部：《长城楹联荟萃》，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
- ⑧③ 樊明芳、熊松华、唐少豪等：《名胜古迹楹联选》，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 ⑧④ 白雉山：《古今楹联选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
- ⑧⑤ 罗哲文：《长城史话》，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2页。
- ⑧⑥ 汪荣祖：《明清史丛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
- ⑧⑦ 赵现海：《十字路口的长城——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与长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13页。
- ⑧⑧ 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the Ming Great Wall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ies on the Great Wall

TIAN Shu, MA Wei-r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academia has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resources concerning the Great Wall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Ming Great Wall, research on the implication of its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mpilation of the resources related to its architecture, tradition, inscription, map and intangible culture. In spite of thes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re is limited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studying the Great Wall. However,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all the resources can offer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the present research.

[Key words] the Ming Great Wall; the border wall; nine defense areas; defense system; the studies on the Great Wall

(责任编辑 胡晓春/校对 谷雨)